

2010

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药学教育简史

王海燕 著

2018

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药学教育简史

王海燕

著

 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简介

本书详尽深刻地对中国药学教育中进行了研究,对有关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考证,归纳出我国药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本书采用断代方式,从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近代六个历史阶段展开研究,并与西方药学教育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对比分析,总结出中西方药学教育发展方面的异同,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丰富和完善了中国药学史。

本书可作为研究中国药学史,尤其是药学教育史的学生及教师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药学教育简史/王海燕著.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8.11

ISBN 978 - 7 - 5661 - 2135 - 6

I . ①中… II . ①王… III . ①药学教育—教育史—中国 IV . ①R9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6074 号

中国药学教育简史

ZHONGGUO YAOXUE JIAOYU JIANSHI

选题策划 龚 晨

责任编辑 张忠远

封面设计 佟 玉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 号

邮政编码 150001

发行电话 0451 - 82519328

传 真 0451 - 825196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960 mm 1/16

印 张 8.5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80 元

<http://www.hrbeupress.com>

E-mail: heupress@hrbeu.edu.cn

序

中国医学史研究正在进入一个主题不断拓展、方法日见多元、跨界研究活跃的新阶段。作为医学史研究、医学教育史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药学史和药学教育史理应得到更高程度的关注。然而,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和中医药学自身的发展特征,古代药学的独立性不甚突出,培养药学人才的药学教育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处于医学的从属地位,这与西方医药学的发展状况是有一定区别的。或许正因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规模、格局原本不大的医学史研究特别是医政史、医学教育史研究中,药学史、药学教育史研究难免相对薄弱。虽然有若干颇有造诣的药学史专家,但尚未形成系统的集群效应,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亦复不少,药学教育史就是其中之一。

本书作者作为一名从药学研究领域走出的青年学人,勇于接受这样一个新课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其迎接挑战的勇气值得充分肯定。

作者花了不小的气力,克服了诸多工作上、生活中的困难,搜集了相当数量的相关文献,沿用较为传统的断代方式,从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近代六个历史阶段展开研究,勾勒出了对中国药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也关注到了某些发展特征。可以说,本书基本上描绘出了在中国医学巨大身影下中国药学教育的历史轮廓,也为相关领域的专题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准备,初步实现了预期目标。

当然,对一位初涉新领域的年轻人而言,这样一个通论性题目毕竟略显庞大。在有限的时间内,即便是成熟的专家想对其中某几个专题深入研究都可能力有不逮。因此,书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薄弱环节。如果此书能够引起学界同仁关注,甚至激发某些讨论批评,相信都是作者乐于看到或者期待的。

应该说明的是,限于主客观条件,本书作者对国外的相近甚至相关研究了解有限,这不免限制了研究的视界和问题意识。而为了方便读者参照对比,作者还是把国外相关研究的基本材料介绍给读者,这主要借助的是前人既有的研

究成果。

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建议本书作者,在走进一个新领域并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开端之后,重要的是坚持走下去。要以现有的工作为基础,打开学术视野,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强化问题意识,深入开展专题性研究,做出更有创造性的成果。

今后的路还长。

程伟

2019年元旦

前　　言

本书从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近代六个历史阶段,对中国药学教育的历史展开研究,并对有关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考证,尽力发掘与勾勒我国药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药学教育的发展与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状况,政府的政策及医药制度等密切相关。因此,本书对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状况、药学发展及医药制度等均做了简要描述,以便更好地展现不同历史时期药学教育的特点。本书附录部分对外国药学教育发展的历史概况做了简要梳理,力求从中外药学教育发展的同异中借鉴经验、铭记教训。

随着朝代更迭和社会变迁,中国药学教育发展的兴盛与衰落和医学教育的状况、药物学的进展、医学本身的发展、医药制度的变迁等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等制约。近代时期,药学教育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指引方向息息相关。作者整理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我国古代药学教育,除隋唐代以外,均与医学教育统一教授。在教学模式上,分为官学教育和私学教育。官学教育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私学教育包括师承授受和私人办学。其中,药业行会组织和民间药铺也对药学知识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代中药教育多以师带徒方式传承。西药学高等教育机构开创了我国药学教育之先河,培养了一批近代药学人才,建立了对后世有影响的药学教育机构、药学教育体制和药学教育方法。

其次,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不仅对我国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而且成为历代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和医学考试的范本。历代的官修本草也有医学教材及考试蓝本的作用。

再次,在一些具体医事史实方面,本书也有所印证和发现。例如,从具体史料中印证了最早的太医署始设于西晋,最早的药园始设于东晋等。

最后,中西方的药学教育最初都是同医学教育统一进行的,西方药学教育却在中世纪时就脱离医学教育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医学缺乏医药分工。

著者

2018年1月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导言 | 1 |
| 第二章 先秦时期的药学教育 | 5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药学知识 | 5 |
| 第二节 早期药学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 8 |
| 第三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药学教育 | 14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药学概况 | 15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药学教育 | 21 |
|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药学教育 | 29 |
|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药学概况 | 29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药学教育 | 33 |
| 第五章 宋金元时期的药学教育 | 43 |
| 第一节 宋代的药学教育 | 43 |
| 第二节 金元时期的医药学教育 | 53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药学教育 | 65 |
| 第一节 明代的药学教育 | 65 |
|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清代的药学教育 | 71 |
| 第七章 近代药学教育 | 75 |
| 第一节 西医来袭 | 75 |
| 第二节 西药教育 | 82 |
| 第三节 中医药教育 | 95 |
| 结论 | 100 |
| 附录 外国药学教育发展史概要 | 103 |
| 参考文献 | 117 |

第一章 导　　言

一、教育的含义与医药学教育

“教育”一词一般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学校教育的工作，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期望方向变化的活动^[1]。查啸虎认为，教育是一种对人的身心各方面进行影响，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的实践活动。就广义而言，教育是指一切有目的、对人的身心各方面产生影响的活动。凡是为了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增强人的体质等活动，不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系统的还是零碎的，都可认为是教育。^[6]

在古代，为了个体和社会的延续，一方面，在生命活动中，个体的与生存相关联的每一种动作、方法的改进都需要在群体中广泛传播，使个体的知识、经验变为群体的经验，这样既改变了个体和群体的生存状态，也有利于种族的繁衍；另一方面，为了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协调，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包括遵循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经验、习俗、礼仪、传统等，这些在客观上都需要有教育。而且医疗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体和群体的生存状态，所以在教育内容上，可能早已涉及医疗活动的相关内容。

就中国古代的医学教育而言，学校教育的产生远晚于医学，而医学知识则主要通过师传和家传的方式进行传播。如果医学知识的传播可以看成是广义教育的话，有理由相信广义上的中国医药学教育是伴随着医学的产生而同步产生的。^[233]

本书应用的教育主要是较为宽泛的概念，而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较为客观地探讨中国古代的医药学教育。本书以时间为序，起于先秦迄于新中国成立前期，对我国古代本草学教育、近代西药教育、中药教育的发

展历史脉络进行了较为系统、详尽的梳理，并通过分析讨论，勾勒出我国药学教育发展的概况。

二、学术史回顾

中国医药学教育的发展历史悠久，然而目前药学教育的专题研究并不多。新中国成立以来，药学史研究逐渐增加，其中较著名的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中药简史》（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年），朱晟等主编的《中药简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郑金生的著作《药林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将中西方药学的发展历史以故事的形式阐述的著作，如高宣亮的著作《药物史话》（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从哲学角度加以剖析的，如赵迎欢等主编的《药物哲学》（东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关于西方药学的译著，如张荣昌的译著《药物简史》（[德]恩斯特·博伊姆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迄今鲜有关于药学教育专题著作，大部分著作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医学教育方面，其中，朱潮等主编的《中外医学教育史》（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88），《新中国医学教育史》（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陈新谦等主编的《中国近代药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董炳琨主编的《协和育才之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药学会编著的《中国药学会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慕景强主编的《西医往事——民国西医教育的本土化之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廖育群著《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和《繁露下的岐黄春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谢惠民等主编的《药学史参考》（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年），对药学教育的历史略有论述；还有专著对古代医政制度和有些朝代的教育状况略做阐述，如梁峻著《中国古代医政史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也有对中国医学考试制度进行研究的著作，其中对药学考试内容也有所涉猎，如王振国主编《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研究》和梁峻著《中国中医考试史论》（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年）。另外，在本书完成前不久，作者发现一部有关药学教育的专题著作，为吴晓明主编的《中国药学教育史》（中国医药科学出版社，2016年），但该书内容偏重对现代药学教育概况的论述，古近代篇幅较少。此外，在各种医学史和药学史专著中对医药学教育的历史也有所涉

及。《中国药学年鉴》从 1980 年创办开始,每一期都对药学教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药学教育史料。

关于药学教育方面的论文在 CNKI 搜索“药学教育”主题词可以找到 7 935 条结果,文章发表时间大多数集中在 2000 年以后,内容主要涉及药学教育现状的分析、药学教育的发展展望、药学教育的改革与探讨、加强临床药学服务等,多是发表于各大期刊或学术会议,其中除沈阳药科大学药事管理学专业田丽娟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药学史研究》对现代药学教育情况做了阐述,沈阳药科大学药事管理学专业刘玉成的博士论文《药学高等教育与医药产业的协同发展研究》对药学高等教育结构与医药产业的适应性加以分析,除此之外,尚未发现系统梳理“药学教育史”的相关学位论文。近年来,关于医学教育的文章比较多,对药学教育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这些文章多对现代医药教育的问题进行分析,也有古代和近代关于医学教育的学位论文,但是有关于古代药学教育的论述较少。

总之,关于药学教育史的研究确实不多且较分散,对从古至今的药学教育发展概况进行系统梳理更是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环。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从先秦到近代新中国成立前的药学教育发展概况进行深入整理、挖掘、研究,以医学史、药学史和教育史为依托,分析中国药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以期为药学教育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三、研究意义

药学教育史是整个医药史及医药教育发展史的一部分,梳理药学教育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药学及药学教育的发展过程,厘清药学与医学、药学教育与医学教育的关系,分析总结药学事业的发展对药学人才和药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在实践层面上,研究药学教育的发展方向,认清药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为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药学教育模式提供借鉴和参考。因此,对药学教育史进行深入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四、创新点

(1) 本书首次系统深入研究、整理了古近代中国药学教育的历史,并与西方药学教育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对比分析,总结出中西方药学教育发展方向

的异同,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

(2)本书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观点,突出了古代药学教育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

(3)经过对中国药学教育历史的爬梳,在一些具体医事史实方面,本书也有所发现和印证。如传统医史研究多认为“医署”始设于南北朝或隋,笔者阅读文献时,发现唯梁峻氏认为“医署”始设于西晋,但未做详尽解释,这与以往观点有所不同。笔者从大量文献史料梳理中,印证了“医署”当始设于西晋之说。又如大量文献记载唐代于京外始设皇家药园培养药园生,但笔者发现王振国氏与梁峻氏均提到东晋已有药园,却未见详细说明。经过翻阅查找资料,终于印证了关于东晋始设药园的记载,东晋时“药园”或“药圃”应是皇家种植草药之地,晋末刘裕在药园筑“药园垒”以抵抗孙恩起义军。这是目前我国历史上设置药园最早的记载。

第二章 先秦时期的药学教育

先秦包括原始社会,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三个历史阶段。原始社会是中国教育的起源时期。夏、商两代产生了奴隶制,已经有了体脑的分工,商朝末期汉字已经发展成熟,统治阶级已经开始注意教育的重要性,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从劳动生产中分离出来,这个变化标志着学校教育的诞生。西周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连贯的学校体系,在教育内容上以“六艺”为核心(“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教育政策是“学在官府”,在夏、商、西周三代,始终没有私学的地位,这是世界教育史所见的。^[9]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动荡的时期,也是教育急剧变化的时期,一种崭新的教育形式——私学,由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士阶层建立起来。自此,学校教育从政府开始移向民间,即“学在四夷”,学术下移,贵族教育没落。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学术争鸣,互相吸纳、补充,促进了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的发展,使这段时期的教育思想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家,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等,还出现了如《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韩非子》等记载了大量教育思想的典籍以及《大学》《学记》《中庸》等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论著,这些论著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当时已存在科学技术教育,如天文历法、地理学、农学、医学和算学等,也就是后世所指的“畴人之学”^[10]。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药学知识

一、原始社会药学知识的萌芽

药物与人类物质生活密切相关,是在人类同疾病的斗争中产生的。原始人

在长期采集和栽培植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然后有意识地用于治疗某些疾病,这就是药物治病的由来。最早发现的药物是植物。在渔猎时代,人们在食用动物的过程中,也逐渐发现了一些动物的肌肉、脂肪、血液、骨髓及内脏的治疗作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人类采矿和冶炼时代的到来,矿物药逐渐被摸索总结并使用^[14]。

二、夏、商、周及春秋时期的药学发展情况

(一) 药物学知识不断丰富

随着人类生产和医疗实践的进步,人类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药物知识。早期的药物学知识基本上依靠口耳相传,直到商代文字出现,药物的采集、产地、性状及功用等方面的认识才有可能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我国殷商时代已发现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有 13 种,然而至今为止尚未有“药”字的甲骨文。在先秦文献《周礼》《诗经》和《山海经》中有很多有关药物的信息资料。《诗经》中就记载了有 100 多种药物,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言采其芹”“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为车前草)。今天人们仍然使用的《诗经》所记载的药物有苍耳、薇蕨、车前草、棠梨、茅、梅、苇、菟丝子、苦菜、麦、合欢、桑葚、益母草、艾、芍药、李、栝楼、羊蹄菜、枸杞、芹菜、大豆等 50 多种^[11]。《山海经》记载有药物 146 种,动物药居首,有 83 种;植物药 59 种,矿物药 4 种。一般药名下均说明产地、形状、特点、效用或使用方法,如杜衡,“其状如共葵,共其臭如蘼芜,可以走马,食之已癰(医治肿瘤)”。药物使用方法有“服、食、佩、卧、浴、涂抹”等^[12]。可见,当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药物知识和经验。

对药物的认识和使用在进入周代社会以后,更有了突出的进步。《周礼·天官》中载:“凡疗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脉,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说明了当时对药物的气、味、自然属性等方面的掌握与认识。而其中的“五毒”,据郑玄注曰:“五药之有毒者……合黄芩,置石胆、丹砂、雄黄、礬石、慈石于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着,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尽出。”可见当时不仅能够使用五气、五味、五药调养和治疗疾病,而且还出现了专门用来治疗疮疡的外用腐蚀药,这也是我国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载。

按在《周礼·大司徒》记载,生物当时被分为动物、植物两大类。动物分为

毛物(貂狼獾貉之属)、鳞物(鱼类)、羽类(翟雉之属)、介类(鱼龟之属)、蠃物(虎、豹、貔、豸、禽之属)共五类。植物分为皂物(柞栗之属)、膏物(杨柳之属)、覩(核)物(李梅之属)、莢物(芥葵王棘之属)、丛物(萑苇之属)等五类。这是初步的生物学的分类知识^[13]。

商代以前,人们习用单味生药治病,且用重剂,副作用较大^[14]。《尚书·说命》中有“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的记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这一情况。至商代,随着药物品种的增多以及对疾病认识的加深,人们已经根据病情不同,选择多种药物组合配成复方,经过煎煮成液后应用于临床治病的可能。这样,将生药转向熟药,将单味药转向复味药,不仅方便服用,而且药效也容易发挥。这无疑是向前迈了重要一步。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发现了我国古老的药方书——《五十二病方》。书中介绍了52种疾病及其医疗药方,共计药方280个,提及药物240种,至今仍然有效的药物有许多。由于当时用药经验不丰富,外治方法占很大比例,有外敷法、药浴法、熏法、熨法、灸法、按摩法、角法(拔火罐)等;药方同时记有煮、丸、酒、煎膏等药物使用方法^[14],书中出现的早期辨证施药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用药水平。

(二)最早的医学分科^[15,16]

在我国商代就有管理疾病的职官“小疾臣”,其既负责医治疾病,同时还从事医疗管理工作,是我国文字迄今所见最早的医官。^①

《周礼》把医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这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分科文献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最初的医学四科原则上将人与兽、内科与外科、食疗与药物划分开,有利于每一分科的独立发展^[140]。周代的分科是以后医药学教育中专业设置的萌芽和基础。周建立了最早的医疗管理制度,有比较完整的医政组织和非常严格的考核制度,对推动我国古代医药学和医药学教育活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据《周礼·天官》记载,周代设“医师……掌众医之政令,聚毒药(因为药物常带辛苦之味和一定的毒性,所以称为毒药)以供医事”。这里所说的医师,其主要职责是为王臣官吏治病以及掌管国家医药政令,同时还负责各地疫情,并在适当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预防和治疗^[142]。

^① 此为中国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在1943年发表的文章《殷人疾病考》中给“小疾臣”所做的注释。

第二节 早期药学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在医药学教育方面,先秦时期可以说开后世医药学教育的先河,不仅是其传承方式对秦汉以后多有借鉴,更在于其为后世奠定了丰富的传承内容。

由于原始社会的医药卫生活动和教育活动还没有从生产劳动、社会活动和宗教活动中分化出来,既没有专职的医生,也没有从事医药卫生教育的教师,更没有医学校。所以,那时的医药卫生活动和知识传授是紧密地结合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进行的。由于还没有文字和书本,所以老的一代向年轻的一代传授医药卫生经验和知识时,只靠口耳相传和观察模仿来进行。“原始社会没有文字,这是许多考古发掘所证明的事实。因此,可以认为原始社会教育主要是靠口耳相传进行的。口耳相传的教育除了在生产生活中进行外,有些原始部落还有成人向儿童讲故事的方式,这是典型的口耳相传的教育活动。”^[7]

后来出现的文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保存、传递文化最理想的工具,记录着人类的经验并能够解释这些经验,医药知识也依赖于这些符号系统得以传承。

一、早期的经验传承

在还没有产生文字的人类社会早期,传承方式主要通过眼观、口说、耳听。例如“小孩跟着大人去采集,大人采什么,小孩就采什么,大人就在采集实践中教会小孩懂得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哪种生吃,哪种熟吃;哪种有毒,哪种没毒等知识。”^[18]“由于对自然界的极端无知和饥不择食,人们常会误食一些有毒的植物而产生呕吐、腹泻,吃了瓜蒂、藜芦会导致呕吐。当然,人们有时也会因偶然食用了某些食物,而使原有的病痛得以减轻或完全消除。正是经过世世代代无数次这样的尝试和经验积累,人们才逐渐获得了一些辨别食物和毒物的知识。他们开始认识到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并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植物药知识。”^[19]这便是植物药的起源了。在认识植物药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了人类社会最早期药学知识传承的大概情况。

“至原始社会末期,在医学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知识和技术。据我国民族

学的调查,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已掌握了关于蛇伤、箭伤、出血、扭伤、肿痛、刀伤、烧伤、痢疾、分娩等的治疗方法。”^[9]人们在与疾病做斗争,积累治疗方法时,积累了更多的医疗经验,对疾病的认识也随之加深。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的加深,对疾病诊疗经验积累的增多,对药物的认识也有可能更加深刻。可以说,医学经验的积累和知识传承促进了药学经验的积累和药学知识的传承。由医学方面的进步可知,药学经验也在逐步丰富并发展着。关于这些经验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据推测可能当时仅仅是散在的发生,而在代代传承与积累的过程中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那里。于是,有了医学不同起源的传说,即由“医食同源”“药食同源”过渡到“医源于圣人”,医、药知识经验传承发展到被少数人集中掌握。

二、神农教民识草木之滋味

涉及我国古代医学起源的文献很多,但基本都将中医学的创立归功于传说中的中华民族始祖伏羲、神农、黄帝。有伏羲制九针而有针灸,神农尝百草而有药物,黄帝论经脉而有医理等说法。关于这一点,《淮南子·修务训》认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其实在医、药学经验的传承中,普通民众的经验积累和杰出人物的经验总结同样重要。

上古传说中,神农、巫彭等医学人物本身就是采药者,客观反映出当时医药不分家的状况。这些神话人物中,神农与药学知识传承关系最为密切。神农氏,又称炎帝,因长于姜水,故姓姜。《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这里记载的神农氏已经是权倾势衰、圣人疲态了。根据《淮南子·修务训》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蠵(螺蚌之类)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里记载的神农氏教民采集食物和农业生产,同时,也教民识草木之滋味。又据《通志·三皇记》中记载:“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乃味草木之滋,察寒温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义,皆日尝而身试之。”其他如《世本》中云“神农和药济人”,《史记·纲鉴》云“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通鉴外纪》亦称:“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多处记载显示,神农氏与本草知识的传承密切相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教”字已经有了知识传承的意味,而